

RES PUBLICA ▶ 公共译丛

The Anatomy of Antiliberalism 反自由主义 剖析

[美] 斯蒂芬·霍尔姆斯 著
曦中 陈兴玛 彭俊军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S PUBLICA ▸ 公共译丛

The
Anatomy of
Antiliberalism
**反自由主义
剖析**

〔美〕斯蒂芬·霍尔姆斯 著
曦中 陈兴玛 彭俊军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 - 2002 - 49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自由主义剖析/(美)霍尔姆斯著:曦中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

(公共译丛)

ISBN 7 - 5004 - 3562 - 2

I . 反 … II . ① 霍 … ② 曦 … III . 自由主义—研究
IV .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0311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页 2

字 数 297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公 共 译 丛

反自由主义剖析

[美]斯蒂芬·霍尔姆斯 著

THE ANATOMY OF ANTILIBERALISM

by

Stephen Holmes

Copyright © 199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本书由美国新闻署协助提供中文版权

译者前言

斯蒂芬·霍尔姆斯 (Stephen Holmes), 1976 年美国耶鲁大学博士, 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大学的政治学系任教, 目前任纽约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哲学与宪法理论, 曾先后出版过几部颇有影响的著作。除本书外, 还包括 *Benjamin Consta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eralism* (1984), *Passions and Constraints: Theory of Liberal Democracy* (1995), *The Cost of Rights* (1998, 与 Cass Sunstein 合著)。

1995 年出版的这部《反自由主义剖析》是一部颇有影响、而且备受争议的著作。称赞者誉之为一部“出色的著作”, 是“对关于美国政治文化辩论的重大贡献”; 而批评者则对其所显示的褊狭甚至不宽容特征大为恼火。但不论赞成者还是批评者都会同意, 这不仅是一部论战性很强、极富攻击性的著作, 而且也是一本研究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的重要著作。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在评论这本书时所说的那样: “任何人如果陷入社群主义而不能自拔, 他就有责任阅读霍尔姆斯先生的这本书, 其他人则应该以一种愉悦的心态阅读这本书。”

这部著作的主题十分明确, 它试图剖析、回击形形色色的“反自由主义”理论, 为自由主义辩护。该书一个重要的创新、同时也最受争议之处是作者将反自由主义看做是一个“传统”。

本来，就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而言，人们可以区分各种各样的传统，如自由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保守主义传统等。这些传统一般都有特定的理论内涵、学派传承与思想沿革。各种传统都会遭遇形形色色的批评。由于自由主义在近代西方乃至世界的特殊重要地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与反思也构成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然则，在一般人看来，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具有一致的理论内涵或确定的思想传承。大体而言，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可分为左派或右派，前者包括诸多激进主义思潮，如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最为全面、深刻而彻底的；后者则包括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在大多数人看来，左派和右派是互相对立的两极，除了二者都激烈批评自由主义之外，它们似乎并无多少共同之处。惟其如此，很少有人将左派与右派作为一个具有逻辑一致性的对象来研究。

霍尔姆斯则强调左派与右派之间的逻辑联系，并将这种逻辑联系描述为一种具有确定内涵、确切传承关系的“传统”。这就是《反自由主义剖析》的基本立意。从这种立意出发，作者剖析了近代以来西方几位著名思想家或学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其中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极端保守的思想家梅斯特尔、德国魏玛共和国及纳粹时期的著名法学家施密特、德裔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当代美国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左派学者昂格尔以及保守主义评论家拉什等。

将这些立场、旨趣、哲学方法全然不同的人物放在一起，揭示其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共同内涵，这确实也是一个有趣的视角。从各种自由主义批评者的理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大致相近的关怀。他们都对近代社会有着某种悲观的情绪，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后果颇为忧虑，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

义可能导致的道德堕落十分不安。

霍尔姆斯在这本书中，以自由主义卫道士的姿态出现，力图将这些人物描述为属于一个相当危险的传统，并对这一危险传统的历史沿革、理论内涵作了分析。这种分析颇似一场作者与这些反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激烈辩论。在辩论中，作者既有深刻而睿智的理论阐释、犀利的讽刺，也有一些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有失宽容、忠厚的文字。特别是作者突出强调施密特在纳粹主义中的角色，并隐含地将当代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与施密特联系在一起，令人感到有“上纲上线”之嫌。

尽管有这些令人遗憾的瑕疵，但这部著作的价值仍然是不容低估的。至少，它将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的主要分歧从哲理上进行了概括与剖析，全面而富有哲理地分析了反自由主义的主要人物、著作及观点。无论自由主义的辩护者还是批评者都会从本书中受到启迪。当然，任何一个对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思想史有兴趣的人都会从中了解到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中一个相当重要但受到忽视的传统。这大概是这部著作的起码价值之所在，这也是我们将它翻译出来，贡献给中文读者的意义之所在。

译者谨识

致 谢

我必须感谢 Bruce Ackerman, Ann Davies, Jon Elster, Don Herzog, Albert Hirschman, Helge Hoibraaten, Romyana Kolarova, David Laitin, Charles Larmore, Susan Liebell, John McCormick, Richard Posner, Nancy Rosenblum, Marion Smiley, Cass Sunstein, David Wooton 和 Bernard Yack, 他们对本书初稿提出了令人振奋而精炼的意见。若没有 Leon Wieseltier 定期在编辑上的鼓励, 本书许多章节将无法完成。同时也要感谢 Joseph Cropsey, William Galston, Harvey Mansfield 和 Nathan Tarcov, 他们都对第 3 章提出了热烈的批评。还要感谢已谢世的 Judith Shklar, 他欣然应允, 愿意随时为我拆解长文, 其情难以报答。Nancy Maull 通读并完善了每个章节, 鼓励我严肃谨慎, 并指责了我多次的拖延。对此, 言谢远远不够。我还很感激古根海姆 (Guggenheim) 基金会在 1988 年度支持我休学术假, 使得汇集本研究所依据的材料成为可能。最后, 要感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Russell Baker 学者基金在 1991 年夏天对研究的支持, 以及柏林高等研究所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定稿是在那里完成的。

前 言

我们必须粉碎精神中一切依靠自由主义而得以存在的东西。

——查理·莫拉斯 (Charles Maurras)

对“自由主义”的诋毁并非 20 世纪晚期一种短暂的时尚，它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特征，至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是如此。19 世纪启蒙运动的敌对者，从约瑟夫·德·梅斯特尔 (Joseph de Maistre) 到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对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渴望都极尽嘲讽之能事。在欧洲，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自由主义难以平抑的敌意，是极右派和极左派都赞同的一种态度。直到今天，在美国的大学中，这种观点被弱化后的表现形式依然兴盛。在专制主义时代，睿智的教授们依然视自由主义为“巨大的敌人”。

为什么美国一些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会斥责一种在所有事物之中，专注于思想自由的传统？20 多年前，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潜在的、然而令人迷惑的影响，为这种奇异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他对“现代性”的严厉控诉，经由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和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的改造，适应了那些新的美国听众的精神状况。作为美国的移民，他们曾受到欢

迎，因而不愿宣称当代的“衰落”是由于“对存在的健忘”（海德格尔的预言）所造成的。对于那些文化上落后的读者来说，这一点完全是不可理解的。衰败源于我们遗忘了希腊城邦（阿伦特）或者忽略了古典自然权利（施特劳斯）。同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帮助普及了海德格尔的看法，即“现代人”已丧失了对自然的最原始的敬畏，对世界采取了一种从根本上说是工具性的态度。他们指出，一种工具性思维倾向，是我们堕落状况的主要标志。我们习惯于工具性地考虑自然，也倾向于工具性地看待彼此。

海德格尔的此类观点，以各种方式被本土化和世俗化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布于美国各大学中。在七八十年代，情形有所不同。对“现代性”的攻击在很大程度上被对“自由主义”的攻击所取代。措辞改变了，但潜藏的敌意、轻蔑和谴责模式依旧。看看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 *After Virtue*（《追求美德》，中译本作《德性之后》。——译注），或者罗伯托·昂格尔（Roberto Unger）的 *Knowledge and Politics*（《知识与政治》），几乎不可能将这些有影响的作品（他们的观点已在报纸言论版中得到了表达）定位于一个从左派到右派的量度表中。但是，二者都对自由主义政治和理念表现出反感，甚至是厌恶。二者中麦金太尔对于其反自由主义的宗教渊源更为坦率，他一步一步地嘲弄“世俗理性”，同时一直以崇敬的态度论述“权威”，以贬抑的口吻论述“民主个人”。相应地，昂格尔最近摆脱了其早期反自由主义的传统主义视角（包括对稳定和安全的渴望），转向一种根本上属于尼采式的，对开放的可能性、人类的创造力和自由意志的强调。这两个自由主义攻讦者的著作将在下文加以详细分析。^①但是，必须在开篇说明的是，他们的主要观点远非新创。他们的思考包含

某种明显的历史渊源。当代反自由主义的先驱应该得到强调，因为当代反自由主义者们常常忽略这一点。他们通常为自己的中心观点提供一个程式化的、甚至删节处理过的谱系。例如，麦金太尔乐于援引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或者阿奎那（Aquinas），但忽略了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政治思想中非常明显的、对自由主义理论和制度的激烈抨击。这种忽略颇为典型。

曾经辉煌但现已名誉扫地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们，如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猛烈攻击自由主义传统。他们批判自由主义的原子论个人主义（atomistic individualism），关于前社会（presocial）个人的神话，对有机性的忽视，对团体的漠不关心，对个人属于更大的整体的否认，对权利的首要性的信仰，对“政治性”的规避，对经济范畴不加批判的接受，道德怀疑主义（甚至是道德虚无主义），抽象的程序和规则优先于具体的价值和责任的决定，对判断中立^②这一假象的矫情的依赖。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异常熟悉。

考虑两个特定的例子。根据麦金太尔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们通常认为，“社会世界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个人意志汇聚的场所”。基于同样的精神，昂格尔批评“将社会视作独立且相互冲突的个人联合体的自由主义社会观”，他还谴责了自由主义将社会视作“意志的战场”，每个人在其中“孤立于他人”的观点。这些主张并非史无前例。事实上，他们极力抱怨被人们同法西斯主义作家们的各种言论相比较，比如秦梯利（Gentile）的观点：“老自由主义的错误在于原子论的社会观，在于将社会理解为抽象个人的偶然汇集和遇合。”^③

同样，麦金太尔认为，他能够仅仅通过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驳倒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即“我是作为某个特定家庭、特定家族、特定部族、特定部落、特定城市、特定民族、

特定王国的一员面对世界的，没有脱离这些的‘我’”。昂格尔也相信，他能通过注意下述事实而使欧洲古典自由主义者们的观点丧失信誉，即他们“作为一个个体来思考这一主题，个人在群体中的参与是其存在的第二位的特征”。但是，麦金太尔和昂格尔对于人的社会性的有倾向性的引用，几乎在每个细节上都被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宣传册作家查理·莫拉斯（Charles Maurras）预料到了：“自由主义想把个人从他所处的自然的、历史的先在状况（antecedents）中解脱出来：它欲将个人从家庭纽带、团体纽带以及所有其他社会 and 传统纽带中解放出来。”^④据莫拉斯（Maurras）所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反社会的大型运动，它反对所有与人类相关的、有道德的、有意义的形式。

并置这些引语并不是要通过它们的互相联系而陷入对“罪恶”的谴责中。我在此并非暗示麦金太尔和昂格尔是半法西斯主义者或者法西斯主义支持者或者带有人道面孔的法西斯主义者。相反，我在说，他们吸收和再造了一种语言技巧，但未能仔细考虑这种语词的历史和暗示作用。我不想指责在美国写作的当代反自由主义者持有危险的思想。我不担心其思想的实际后果。（他们从历史环境中受益，这种环境使得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危害。）相反，我想注意他们思想中根本上是反历史的，因而也就不清晰的特征。反自由主义者无休止地谈论根基和传统，痛惜历史意识的极度匮乏（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但是，他们却漠然无视他们自己的智识谱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将自己同那些最声名狼藉的先驱们区分开来。[毕竟，他们偶像化了“社群”，而不是国家或“人民”（das Volk）。他们没有寻求一个领导去追随，没有从事特定的委过于人的活动或偏执地寻找实际的敌人来消灭，等等。]但是，他们没有努力进行澄清，以解释他们同法西斯主义哲学家们的区别，这些哲学家的言辞常常同他们自己的言辞难

以区分。这样，就让读者陷入了困惑。举另外一个例子，他们兴高采烈地谴责他们所认为的自由个人“组织忠诚”（constitutive attachment）的缺乏，但是他们从未提及，这种抱怨长期以来是反犹宣传的中心观点，是对背井离乡、四海为家的犹太人进行政治攻击的中心观点^⑤。

对他们最钟爱的观念之渊源和政治上的滥用缺乏关注，并不是当今反自由主义作家惟一的缺点。在研究现在和过去的单个反自由主义者的过程中，我还注意到另外两个缺点：他们所提供的政治方案的非现实性或乏味性，更为重要的是，其论点的内在不一致性。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尽管有时是令人信服的，但通常都言过其实。当然，自由主义社会显示出无数失败，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有缺点。下面关于反自由主义思想的任何分析都不暗示自由主义制度或自由主义思想不应受到批评。相反，自由主义社会和自由主义思想都应该单独地、顺序地受到批判，而不是像反自由主义那样同时对之进行批判。

为了有效地批评自由主义，必须严格区分两种批评对象：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社会。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一直是一种没有实现过的渴望。自由主义理想仅仅是不完美地体现于现存自由主义社会中。结果，同时批评理念和现实，这在根本上是混乱的。只有在按照它们各自的术语先后批判的时候，才是对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社会最好的批判。但是这种区分本身就是反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的。事实上，不愿分别审视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社会，是反自由主义思想的标志，因为反自由主义者假定，自由主义社会完美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理想。因此，他们断定，自由主义社会的明显缺点，直接来自于自由主义原则的不足。自由主义社会有缺陷是因为它们是成功地按照自由主义理念组织起来的。当然，沿着这条思路思考的批

评者们，不需要区分对自由主义文本的批评和对自由主义制度的批评。他们相信，这两种形式的批评，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是一样的。

漫不经心地将理论批评和制度批评混同在一起是令人困惑的。同时，它还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实际结果：它轻视了根据自由主义理念对自由主义社会进行的批判性评估。然而，这是自由主义社会所遵从的最重要的评估形式。任何使具有改革意识的批评更为困难的方法，都应受到怀疑。当一个自称自由主义的社会不保证平等的投票权或者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时，它就违反了自由主义的规范。若它将制度上赋予所有公民的权利不给妇女、黑人或者犹太人，它就是以一种公然非自由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指出这一点是政治评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此类批评仅在严格区分规范和社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种对所谓的自由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式的不满，被反自由主义者所轻视，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所有的社会毛病都是自由主义理念的逻辑后果。

批评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必要性不亚于批评自由主义社会，并且，它也能成为一种完全自由主义的程序。回想休谟（Hume）对洛克（Locke）的“原初契约”理论的攻击，穆勒（Mill）对边沁（Bentham）的批评，或者康德主义者（Kantian）同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之间的相互批评。自由主义作家自相矛盾，并且相互驳斥，产生了各种形式的逻辑和实证错误。此外，曾经极具说服力的观念，会因时间流逝而渐显陈旧。（例如，大部分 18 世纪的著作，不包含对 20 世纪晚期许多紧迫问题的合适的回答，如人口膨胀、大规模迁徙、争斗激烈的边境、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等等。）但是，下面我所研究的反自由主义者们，并没有在这样一种普通意识下批评自由主义理论或自由主义文本。他们不满足于揭露自由主义在智识上

的弱点，或者展示自由主义同业已变化的社会图景的不相关性。其旨趣更为远大。他们审视自由主义理论不是为了找出其智识上的弱点，或揭示其陈旧，而是为了发现当代危机的根源。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视为有时不适应当前的问题（这已足够了），而是将它看做当前问题的惟一来源。他们称，为了理解当前的困境，必须参阅含有错误的哲学著作，这些著作开启了现代性的源头。看起来不太友善的字里行间对这些书籍的解释，是社会学的一种精妙形式。事实上，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是社会规模上的病理诊断。最重要的社会病症源于理论错误这一假定，赋予反自由主义者们高度抽象化的论述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尽管并非完全有说服力的）政治参与意味。

卡尔·施密特和列奥·施特劳斯尽管有诸多差别，但都认同这一基本假定。他们还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超级宽容主义（hypertolerance）或“消弭一切（anything goes）”的意识形态。他们指责道，自由主义者将宽容置于“投降”的地步，自由主义者在受到攻击时完全不能自卫，等等。按照温和的标准，本书计划在实际上驳斥这一指责。反自由主义者讥讽自由主义，并将其描述为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的回答正好同他们自己的著作一样富含争议。我希望，这一回答是记录详尽并且公平的。我所讨论的那些有争议的作家最后都宣称，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整个西方世界都将堕落、败坏，当然也不能抱怨一种相反的反驳。

在试图针对反自由主义者来做他们曾经针对自由主义者所做过的工作（突出反自由主义者立场的根本缺点）的时候，我并未模仿反自由主义者的机械主义方式。我不认为他们是恶魔或叛逆，这是他们通常描述自由主义者的方式。他们仅仅是理论家，尽管有一些有趣的、正确的洞见，但常常充满矛盾和错误。因此，我的目的是批判，而非控诉。如果我使读者信服了非马克思

主义的反自由主义在智识上的缺点，我就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如果因为理论清理和派系争论而使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关注，我也获得了最小限度的成功。

注释：

① 另一部按照麦金太尔—昂格尔模式写作的、有影响的著作是 Michael Sandel (桑德尔) 的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自由主义和正义的局限》)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桑德尔热烈赞扬了对“特定家庭、社群、民族或人民”的“忠诚”和“忠贞”，以此装点其概述以及对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的立场的批评，他视之为对美国社会的批评。他还从总体上严厉批评自由主义解开了伦理、宗教和社会“纽带”。

② 施密特的著作在第2章中被加以讨论。关于 Giovanni Gentile (秦梯利)，见 *Che cosa è il fascismo* (Florence: Valecchi, 1926)；以及 *Genesi e struttura della società* (Florence: Sansoni, 1946)。

③ Alasdair MacIntyre (麦金太尔), *After Virtue*, 第2版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p. 25;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昂格尔), *Knowledge and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pp. 20, 229; Gentile (秦梯利), *Genesi e struttura della società*, p. 65.

④ MacIntyre (麦金太尔), *After Virtue*, p. 172; Unger (昂格尔), *Knowledge and Politics*, p. 211; Charles Maurras (查理·莫拉斯), *De la Politique naturelle au nationalisme intégrale* (Paris: Vrin, 1972), p. 103; 莫拉斯的反自由主义激烈言辞，具有极强的适应性。甚至时至今日，它还几乎逐字逐句地出现在天真的美国新闻工作者的思索中，而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其纯正的法西斯主义血统：“18世纪的理性主义试图展望这样一种人性，它去掉了那些被假定为非本质的属性，如文化、伦理和阶级特殊性” [George Will (乔治·威尔), *Statecraft as Soulcraf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 143]。

⑤ MacIntyre (麦金太尔), *After Virtue*, p. 59; Sandel (桑德尔),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p. 180.

目 录

译者前言.....	(1)
致谢.....	(1)
前言.....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反自由主义者

第一章 梅斯特尔与反自由主义传统	(17)
(一) 人的社会性	(20)
(二) 权威的决定	(23)
(三) 神秘主义	(26)
(四) 科学的腐蚀剂	(29)
(五) 自我的无效性	(31)
(六) 暴力与战争	(34)
(七) 诺斯替主义倾向	(40)
(八) 结论	(44)
第二章 施密特：自由主义的无能	(51)
(一) 仇恨的两种概念	(54)
(二) 国家权力的两种理论基础	(56)
(三) 政治虚弱的文化	(59)